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典学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美] 欧文 Clifford Orwin ● 著

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

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戴智恒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古典学从编

刘小枫 ● 主编



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

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美] 欧文 Clifford Orwin | 著

戴智恒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美)欧文著;戴智恒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5. 1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ISBN 978-7-5080-8287-5

I. ①修… II. ①欧… ②戴… III. ①修昔底德 (前 460~前 400) —史学思想—研究 IV. ①K09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0397 号

Copyright © 1994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5064

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

著 者 欧 文

译 者 戴智恒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0.5

字 数 252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古今丛编”出版说明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因应与西方政制相遇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我国学界诸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禀赋和志趣奋力译西学典籍,翻译大家辈出。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典籍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偶然性。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典籍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秣积,至 80 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尽管这套汉译名著的选题设计受到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迫切感到必须重新通盘考虑“西学名著”翻译清单,首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虽然从重新认识西学现代典籍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侈谈所谓西方文化,实际谈的仅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尤其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出现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并未涉及西方古学。对西方学术传统中所隐含的古今分裂或古今之争,我国学界迄今未予重视。中国学术传统不绝若线,“国学”与包含古今分裂的“西学”实不可对举,但“国学”与“西学”对举,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现代学术习

2 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

性:凭据西方现代学术讨伐中国学术传统,无异于挥舞西学断剑切割自家血脉。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问题的关键,於庚续清末以来我国学界理解西方传统的未竟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自 2003 年起步以来,迄今已出版二百余种,以历代大家或流派为纲目的子系初见规模。经重新调整,“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将以子系为基本格局进一步拓展,本丛编以标举西学古今之别为纲,为学界拓展西学研究视域尽绵薄之力。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甲组

2010 年 7 月

只要人性是相似的……

修昔底德是一位喜欢与荷马较劲的历史记录者,也是一位让柏拉图尽量回避的政治书写者。修昔底德断定伯罗奔尼撒战争是过去所有战争中最伟大的一场战争,自诩《战争志》是“永世瑰宝”(ktēma te es aiei)——这并不过分。

修昔底德有一句名言——“只要人性是相似的(heōs an hē autē physis anthrōpōn ē),这样的灾难将总会发生”^①(《战争志》Ⅲ. 82)。这言辞是针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第5年(即公元前436年)科基拉革命(stasis)而说的。据修昔底德记载,科基拉城邦中的民主党人与寡头党人相互残杀;大量公民被控以阴谋推翻民主制的罪名残遭杀害,有些人只是因私仇被处死;屠戮手段异常残忍,有的是父亲杀死儿子,有的是被拖出神庙杀死,有的是被封堵在狄奥尼索斯神庙里杀掉(《战争志》Ⅲ. 81)。正是这样的杀戮,使得修昔底德感慨起了“人性”,指摘双方的报复行为“越过了正义和公共利益的界限,两个派系只以一时的任性为准绳;他们随时准备宣布非正义的定罪处罚,或者通过暴力行为赢得优势,以发泄一时之恨。”(《战争志》Ⅲ. 82)

现代人面对修昔底德的这种言论总是难免心有疑惑,仿佛这位

^① Smith,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希腊文-英文对照本),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9, p. 142. 后文凡引自《战争志》,将随文标注章节码。

古人说的不是古事而是现代之事。如果说科基拉革命揭示了政党斗争中的“人性”问题,那么,雅典同盟与斯巴达同盟所进行的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更是在磅礴风云之中展现了人类政治事务的“本性”(physis),尽管修昔底德的著作只记述到战争第二十一年就结束了。

正因“人性是相似的”,现代学者往往声称20世纪西方历史上各个阶段的政治冲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犹如修昔底德笔端的政治事务在现代重演。^①在现代国际政治学领域,修昔底德一直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伟大古人。

研究修昔底德从来不是国际政治学者的专擅。美国学者欧文(Clifford Orwin)的《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②展示了一种抱负,试图“与一位远古的伟大心灵对话”;对话的可能性在于修昔底德《战争志》“只向某种阅读方式敞开自身”,它需要“如牛儿一样的读者,懂得如何反刍的读者”(页12)。欧文秉持一种经典解释学原则面对修昔底德文本自身,他的研究旨趣也就显得与众不同。

欧文没有依照修昔底德的叙事顺序疏解修昔底德的整部作品,而是按照自己的问题意识诠释修昔底德笔端的“言辞”(logōi)和“事行”(erga)。他最先讨论的是《战争志》卷Ⅱ中伯利克勒斯(Pericles)的“葬礼演说”,却不是卷Ⅰ中修昔底德的“考古”和战争起因。任何一位修昔底德研究者都不可能忽视伯利克勒斯的“葬礼演说”。欧文开篇直奔“葬礼演说”是出于这样的思量:“修昔底德所叙述的雅典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自伯利克勒斯顶峰时期以降的悲剧性沉沦”(页28)。这就是说,欧文意在用一种拉开序幕的方式,向读者首先呈现“葬礼演说”为雅典所披戴的“节日盛装”,以究雅

① 参见魏朝勇:《自然与神圣——修昔底德的修辞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16页。

② 以下凡出自欧文(Clifford Orwin)论著的引文将随文标注原著页码。

典顶峰之际的帝国品性。

我们不能把修昔底德的纪事理解成是“雅典的沉沦”史记。欧文也无意探讨雅典帝国为何衰落,他欲求回答:雅典帝国的雄心和负累“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境况的两个重要方面,即正义的要求与必然的要求之间的永恒张力,以及一种高贵政治的可能性,究竟意味着什么?”(页29)

论著第二章才着手回溯修昔底德的“考古学”,讨论战争的咎责,分析科基拉人和科林斯人分别劝告雅典人的演说辞,指出科基拉人的“正义”要求服从于“力量”,目的是希望雅典为增强海军实力考虑结盟,而科林斯人在劝说雅典人拒绝科基拉人时,其中“必然”的诉求与正义的选择也显得模糊。欧文着重解析了雅典使者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对斯巴达人的劝诫之辞,探析雅典帝国力量增长,以及这一历史态势中所涵括的自然、必然与正义等问题。欧文认为:“如果雅典在自然的强迫下驾驭帝国,她就践行其自由意志的正义。尽管很有力量,自然的必然却不会碾碎人的自由。对于最强者,自然至少应允真正正义的可能,而真正正义得之于高贵恰如它得之于困难和稀有。这样的正义若能在邦国间建立,就是强者对弱者的美惠,它植根于自然对那些渴望美德的人们的美惠之中。”(页63)这意思其实是,“自然的必然”并不导致“强力就是正义”或“正义就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

邦国间的战争伴随着同盟政治的嬗变。欧文在第三章转而梳理米提列涅人、普拉提亚人、底比斯人与斯巴达的关系,阐释正义、德性、忠诚与利益诸议题。斯巴达是一个这样的城邦,它“持守由每个平等自治的希腊城邦所组成的全体希腊的公共善观念”(页75)。但为了自身安全和利益,斯巴达也毁灭了普拉提亚。斯巴达不是雅典帝国的反例。不过,欧文没有否认斯巴达的审慎和虔敬,甚至说,“恰好通过肯定雅典命题,斯巴达尽其本分地消除了帝国不正义的罪责”(页86)。

在邦际政治中,雅典帝国难以弥息“自然的必然”与“正义”之

间的紧张。这一紧张也牵涉“必然”与“虔敬”的纠葛。论著的第四章到第六章在“必然”与“虔敬”、“正义”与“利益”等关联域中,主要讨论了“弥罗斯对话”和西西里远征,厘清尼基阿斯、阿尔喀比亚德和爱乌菲穆斯的演说中所呈现的几种雅典面相。欧文指出:“斯巴达胜在她的虚伪犹如胜在虔敬,雅典败于她的虔敬犹如败于不虔敬”(页142)。论著第七章重审“雅典命题”,解读狄奥多图斯就如何处置米提列涅人所发表的演说,以及徐拉古人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Gela)所发表的演说。欧文论说道,“狄奥多图斯先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尼采,把犯罪作为基本人类事实而非一种越轨来探看,并要求我们反思后果。首当其冲的就是调解正义与利益的真正困难。”(页156)而“赫摩克拉特斯的演说补充了狄奥多图斯的演说,对后者所论述的诱使城邦冒险的欺骗作了引申。人们对命运眷顾的假设,结果(毫不奇怪地)只是依赖于一种对正义力量的假设。”(页168)。

帝国的正义与城邦内部政治息息相关。“在修昔底德所展示的世界中,城邦与其说追求一个完美正义的幻影,不如说总是面临迫切的忧虑”(页173)。论著第八章回望了修昔底德笔端的雅典瘟疫和科基拉革命。发生在伯罗奔撒战争第二年的雅典瘟疫在人性层面上挑战了雅典的荣耀和正义。在濒死的时刻,雅典人既不敬畏诸神也不畏惧人的法律,觉得“再多享受一下生活,才是唯一的公平”(《战争志》II. 53)。科基拉革命则是党派斗争导致的城邦内乱,使得希腊社会“蕴于高贵天性中的纯真”消失殆尽(《战争志》III. 83)。瘟疫和内乱都是城邦破裂的途径。颇具兴味的是,欧文断言“内乱展示了生活的激进‘政治化’后果,瘟疫则展示生活的‘去政治化’后果”,并在身体政治层面把瘟疫和内乱看作是对伯利克勒斯“葬礼演说”的一个注脚,且“内乱和瘟疫一致暗示,对人类来说,没有比摆脱身体所造成的束缚更大的政治不幸”(页182)。同时,雅典瘟疫考验了雅典民主政制,科基拉内乱则是民主制与寡头制的较量,有鉴于此,欧文还论析了修昔底德笔端的政制问题,申明“稳定性虽是

修昔底德评价诸种政制时的首要考虑,却不是唯一的考虑;修昔底德分有雅典对崇高目标的典型抱负,涤除了雅典同样典型的不审慎”(页192)。

修昔底德笔端的雅典和斯巴达共同构筑了“希腊性”(Greekness)的顶点和高峰。雅典与斯巴达是战争的对手,也是政制的对手,甚至是希腊伦理的对手。雅典通常使正义和虔敬让位于自然的必然,斯巴达似乎更为虔敬和审慎,但斯巴达与雅典不是绝对的互为映照的反面。在虔敬之维考虑正义,雅典做得不亚于斯巴达;让正义臣服于利益或必然力量,雅典做得也不比斯巴达更多。

欧文在其论著的结论部分,重新回顾雅典使者在斯巴达同盟大会上所作演说中的“雅典命题”,以及伯利克勒斯“葬礼演说”中的“雅典主义”。“雅典命题实质提出了一个恼人的问题,即人们于何处(或是否)能够在必然性的要求与人类德性及选择的领域之间划定界限”。而“雅典主义的代言人一再自相矛盾,一方面拒绝抵抗被设想为有利条件的‘必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声称要这么做”(页196)。欧文再次检审了从伯利克勒斯、狄奥多图斯到尼基阿斯和阿尔喀比亚德等人的政治言辞,以期把握帝国正义、理性和虔敬的脉络。欧文最后说道:“我试图表明,所有追寻修昔底德观点的线索并充分化为自己观点的读者们,都会理解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页206)

修昔底德所展现的政治生活是严峻的人性难题,尤其在这一点上,修昔底德区别于他之前的史诗诗人和编年史家。面对修昔底德的世界,人们不免想从其时代的智识思想中寻求解答。欧文却没有这么做,他自始至终立足于修昔底德《战争志》自身,寻觅人的言辞和事行中潜藏着的政治伦理变化和轨迹。我相信,欧文的论著向人们贡献了一种进入修昔底德笔下政治事务和人性图景的可能路径。

欧文的《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由在读博士生戴智恒独立翻译完成。在翻译过程中,他多次通过邮件与在美国的欧文教授沟通交

流,以解书中疑点和难点。仅就该篇序言所援引的欧文著作段落而言,我也给了一些翻译意见。但整部译文的好与错漏(如果有的话)都由戴智恒承担。他的勤勉和责任心为此作出保证。

欧文论著的中文版面试将裨益于我国学界对于修昔底德的研究。在我国学界,阅读和研究修昔底德是一种寂寞的行为,因为修昔底德毕竟是一位来自远古的“异乡人”。然而,“只要人性是相似的”,修昔底德一样有助于我们思考我们所过的和将要过的政治生活——对此,我深信无疑。

魏朝勇

2014年11月11日于中山大学

致 谢

[ix]写作此书所耗费的时间,并不比伯罗奔半岛战争持续的时日长。然而,在这十二年的耕耘岁月里,我一直受益于多方的恩惠。在经济和其他建制性的帮助上,感谢多伦多大学及其政治科学系连任多届的慷慨的董事长们,感谢国家人文学科奖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艾尔哈特基金(Earhart Foundation)、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芝加哥大学、罗马的美国学院图书馆及其前任主管罗格斯·斯卡德博士(Dr. Rogers Scudder)。在整理手稿的最后阶段,我得到了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助手克拉克(Randall B. Clark)的鼎力相助。承蒙《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政治学学刊》(*Journal of Politics*)、《城邦》(*Polis*)、《政治学评论》(*Review of Politics*)以及慕尼黑的卡尔·弗里德里希·西门子基金会的许可,我原初已由它们发表的文献经过修订得以再次使用。

我还要感谢所有邀请我开设修昔底德讲座的友人们,感谢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它们的访问邀约使我有机会在其出色的学生面前锤炼我的论文观点,令我受益匪浅。同时也要衷心感激的是我在多伦多大学里同样优秀的学子们。

对于许多师长、朋友和同事的鼓励和批评,我表示真诚的致谢,不过我不敢保证他们所有人都认同我的研究成果;他们包括班菲尔德(Edward C. Banfield)、贝娄(Saul Bellow)、博洛廷(David Bolotin)、布鲁尔(Christopher Bruell)、科甘(Marc Cogan)、埃德蒙斯(Lowell Edmunds)、艾普斯坦(Joseph Epstein)、埃乌本(J. Peter Euben)、弗拉斯哈尔(Helmut Flashar)、福特(Steven Forde)、格雷纳

(David Grene)、霍尔默斯(Stephen T. Holmes)、卡根(Donald Kagan)、克雷纳克(Robert P. Kraynak)、雷博维茨(David Leibowitz)、莫内(Pierre Manent)、迈尔(Heinrich Meier)、马泽尔(Arthur M. Melzer)、尼科尔森(Peter Nicholson)、潘戈(Thomas L. Pangle)、鲍威尔斯(Patrick F. Powers)、舍费尔(David L. Schaefer)、已故的施克莱(Judith N. Shklar)、梭罗多(Joseph Solodow)、塔科夫(Nathan S. Tarcov)以及辛曼(M. Richard Zinman)。我想特别感谢诸位助我一臂之力洞悉修昔底德之希腊文的古典语文学者,尤其是华莱士(Malcolm B. Wallac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读者所付出的诸多努力为本书增色不少,其中一位便是汤普金斯(Daniel Tompkins)。该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瓦尔德(Ann Himmelberger Wald)在悉心鼓励、工作效率和质量把关方面,都堪称楷模。我的文字编辑罗伯斯(Carol Roberts)提出许多改进建议,免去我不少错误(倘若不是我固执的缘故,他原本还可以为我省去更多的错处)。

至于已故的布鲁姆(Allan Bloom)教授,他曾是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导师,后来(在晚年时期)又在多伦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和我成为同事,我无法[x]夸大对他的那份感恩之情。他曾激励我钻研古典(和现代)思想,并不断地指引和滋养我的研究。尽管他的教学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绝伦一幕,但指导我在哈佛攻读研究生的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却证明有实力与之媲美。我想象不出与我同辈的一代人中,有谁能受惠于更好的老师。

我的妻子多娜(Donna)一直给予我信任和支持,即使她彼时亦正忙于潜心研究托尔斯泰,而我们的儿子们虽然能想到更适合我做的事情,但还是默然同意这个研究计划。至此,我在献辞中已经表达了我首要的答谢。

关于注释的说明

本书的注释参考了现代的著作或论文,或者古典的作品。对古典作品的引用,我采取了传统按照卷、章(或页码)的划分形式,皆可与其所有版本对应,譬如希罗多德《原史》6.9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2.8,柏拉图《王制》355a。这类作品恕不一一在参考书目中列出。前苏格拉底哲人的残篇将根据迪尔斯/克兰兹(Diels/Kranz)的标准编目进行引用;其英译文均可在费里曼(Freeman)的《前苏格拉底哲人阅读指南》(*Ancilla to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中找到;这两本著作我已列在参考书目中。

至于现代著作,我采用以下方法处理。为了节省空间,同时以备读者通过书目的页码搜查原初相关引用条目之需,每部文献均自始至终以相同的缩写形式对应于参考书目的条目来进行援引。就一部著作来说,引用信息包括作者的名字、简要的书名以及页码,例如罗米莉(Romilly),《帝国主义》(*Imperialism*),页231。对于期刊中某篇论文,引用时会出现作者的姓名、期刊的缩写标题、卷号、年份以及页码,如Romilly, *REG*,第103期(1990),页376-378。若是一本书中的某篇文章或章节,引用的形式如下:Stahl载于 Stadter 所编的《演说》*,页64;Strauss载于Strauss所编的《研究》**,页174。不管是哪种情况,参考书目都会提供完整的信息,包括书或期刊的未经简化的标题。为了方便查找,参考书目中的条目以作者名字为

* [译注]《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的简称。有中译本,王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 [译注]《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的简称。有中译本,张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2 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

准,并遵循以下原则依字母顺序排列:书籍取其标题的关键词(通常是第一个名词性实词);文章一般取其所载期刊的名称或者该卷编者的姓氏。因此,拉特纳(Lateiner)发表于《古典语文学》(简称为CP)的文章在参考书目中要列在他另一篇载于《古典世界》(简称为CW)的文章之前,不管两篇文章各自的日期和标题。同一作者在相同刊物发表的文章将按年代顺序排列。

关于叙述方式的说明

修昔底德笔下的主要角色是城邦而非个人,因此从文体上考虑,似乎有必要避免城邦名称的无谓重复,不论它们是主格、属格抑或形容词性形式。但是,指称上一个提到的城邦为“它”,和用“它的”作为其属格形式,同样会引来问题,因为某个城邦有时得和众多其他事物并置在一起,共用这些代词,会使得读者根本不可能分别找到每个“它”的所指。为此,我采用了传统习惯的做法(从希腊语、拉丁语和罗曼语继承而来),把各个城邦假定为阴性。这样一来,某个具体的城邦名称就可以巧妙地穿梭于布满“他的”与“它的”的冗长段落之间,既避免重复,又不会让读者为若干代词的指代问题困惑不已。

由英语所吸收的上述语种惯用的城邦性属,与其说关涉性别,不如说只有语法意义(这一区分对于掌握着高度中性化语言的英语使用者来说,起初并不容易接受):法语中“匙勺”属于阴性,但讲法语的人从不认为它们是女性的;然而在德语中“匙勺”却是阳性的,也没人将其想象成男性。同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希腊文中的城邦(*polis*)(从词源上讲类似于其他印欧语词,表示“堡垒”的意思)或者拉丁文中的城市(*urbs*)(其词源很可能是指“有限的范围”)最初用于表达城邦所带有的女性意味。诚然,一个无性征的事物带有阴性的性属(*gender*),确实会让人联想到某种比喻性的用法,或者暗示该事物所蕴含的阴性特征的诗化旨归。但我并不是一个诗人。读者应当明白,对城邦和女人使用相同的语法性属,我这样做并不想要将女性的任何特征归于城邦。

目 录

中译本序	1
致谢	1
关于注释的说明	1
关于叙述方式的说明	1
引言	1
第一章 序幕:雅典帝国作为自由选择的事业:伯利克勒斯“葬礼演说”	18
第二章 战争爆发和罪过问题	39
问题的形成	39
“正义的是……”“必然的是……”	50
斯巴达首次大会和科林斯使者的演说	55
自然、必然与正义:雅典使者在斯巴达的演说	58
“五十年”作为雅典使者演说的评注	66
雅典人在斯巴达演说的未决张力	71
透过斯巴达的眼光看问题	75
第三章 常态下的正义	85
正义、德性和同盟的责任:米提列涅人在奥林匹亚的演说(3.9-14)	85
普拉提亚和底比斯	93
斯巴达的正义与雅典论说	100